

# 结构压力是国家间 互动造就的<sup>\*</sup>

徐 进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围绕体系与单元的关系形成了体系决定论和单元决定论两大阵营。作者提出了一个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旨在重新思考体系与单元之间的关系。弱结构现实主义既反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绝对结构选择，也反对还原理论的绝对单元选择，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弱结构现实主义在遵循结构现实主义一系列基本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这一点除外）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理论，主张体系必须通过结构压力才能驱动单元，结构压力是一个变量而非常量。结构压力的变化是国家间互动造就的。这样，弱结构现实主义就恢复了单元的能动性，形成了一个单元与体系双向互动的模型。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弱结构现实主义可以更好地解释和预测较长时段内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变化；相较于还原理论，弱结构现实主义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较长时段内大国关系发展的整体性趋势。弱结构现实主义既反对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政治悲剧的命定式论断，也反对还原理论特别是大战略理论寄望于个人或团体能一举扭转大国政治悲剧的愿望式论断。

**【关键词】** 结构压力；弱结构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体系理论；还原理论

**【作者简介】**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24) 10-0087-22

<sup>\*</sup>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YZD04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体系与单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围绕这一对矛盾，国际关系学界形成了体系决定论和单元决定论两大阵营。体系理论学者坚信“结构选择”，即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国家执行的政策与发挥的作用并不重要；还原理论学者通常强调“单元决定论”，即国家的领导人、政治结构、利益集团以及国家间的战略互动对国际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现实世界并非与两类学者的叙事逻辑相吻合。本文提出了“弱结构现实主义”，希望能够在上述两大阵营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弱结构现实主义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变体，它在遵循结构现实主义一系列基本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这一点除外）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理论。一方面，弱结构现实主义承认结构对国家行为的“选择”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在结构面前并非被动无为，而是具有相当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采取抗拒、规避、拖延或驾驭等多种方式应对结构施加其上的“命运”。实现这种对体系与单元关系辩证式调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理解二者之间的结构压力。简单地说，结构压力是体系施加于单元并驱动单元行为的压力，但体系不会自动产生这种压力，该压力实际上是由国家间互动造就的。

## 一 国际关系中的两种决定论及其批评

体系与单元的关系之辩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层次分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分别在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分析了国际战争发生的原因。<sup>①</sup>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系统地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sup>②</sup>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研究属于体系理论范畴，国家层次则属于单元层次的研究。<sup>③</sup>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分为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体系理论是指体系层次的理论研究，以体系特性作为解释依据；还原理论是指单元层次的理论研究，以单元特性作为解释依据。<sup>④</sup>对研究层次的区分是体系与单元关系之辩的根源。

体系理论学者强调体系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华尔兹认

---

①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77-92.

③ 此外，还有次国家层次的研究，即打开国家的“黑箱”，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国际问题。

④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0页。

为只有体系层次的研究才能称为国际政治理论，而还原理论只能称作对外政策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构成。<sup>①</sup> 结构是体系层次的要素，由实力最强大的几个单元形成的实力分配状态所决定，可分为单极、两极和多极。结构就像选择器一样，通过奖励和惩罚对国家的行动进行筛选，从而使国家行动逐渐趋同。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其理论逻辑的核心是结构选择，即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家冲突或促成合作的行为。结构选择本质上是结构决定论，认为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对单元的行为产生决定性作用。它迫使所有国家按照结构的要求行事，违反者将受到结构的惩罚。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线叙事，单元被笼罩在结构的阴影之下而缺乏能动性，或者说单元即便有能动性也是不重要的，因为它无法走出结构的阴影。

在华尔兹的著作《国际政治理论》出版以前的很长时间内，还原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该理论主张从单元和次单元层次出发寻找国家行为的动因，认为国家的特征、政策、文化、互动方式、党派、利益集团和决策者都会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还原理论的成果较为丰富，包括但不限于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心理学、大战略研究、对外政策分析和决策理论等。但还原理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可选的自变量过于繁杂，因而难以构建一个类似体系理论的严格且简约的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在体系与单元关系之辩中走出一条中间道路，是带有体系色彩的还原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虽然研究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但这些问题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探讨当面临相同的体系结构和压力时，为何国家做出的政策反应不同。<sup>②</sup> 为解答这类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的国内政治因素与结构现实主义强调的国际体系结构相结合，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国家的对外行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指出，国际结构和体系压力通常只能塑造一国外交政策的大致轮廓或将一国外交政策选项缩小到一定的范围，但不能强制性地替代决策者做出明确而唯一的决策，在各类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决策者对国际结构变化的主观认知才是一国具体外交政策的直接动因。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侧重于研究国内政治因素

<sup>①</sup>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42页。

<sup>②</sup> 最初给这一学派命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文献，参见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比较全面的论述，参见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对决策者的影响，因此其本质上是一种还原理论或对外政策理论。<sup>①</sup>更严格地说，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结构+单元研究路径，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因为独立的理论需要有统一的核心解释变量。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变量繁多，这也是它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体系理论还是还原理论，都是构造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式。它们各有优缺点。体系理论是一种高度简约、科学而宏观的国际政治理论，但无法对国家具体的对外政策予以解释。华尔兹认为体系理论只需要能够解释少数反复出现的重大现象，而无须面面俱到地去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同和变化。因此结构现实主义更加倾向于对国际政治做出整体性解释并规避反常现象，当有些现象能被体系理论解释时，它便宣称自己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当有些现象未能被体系理论解释时，它则宣称时机不到或这些现象不属于其解释范围。另外，国际结构的变化频率很低。如果体系理论只有国际结构一个自变量，那么在长时段内国际结构实际上可被视为常量而非变量。但国家行为和国际结果又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因此单纯从国际结构出发，难以满足人们更精确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现象的要求。

还原理论长于对各类国际现象和国家行为进行全面细致的解释，但华尔兹对其提出了批评，如单元性质以及互动模式的变化与单元行为的结果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尽管行为体的属性和互动方式千差万别，但国际结果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却始终存在；仅仅根据各国的内部构成和自身属性难以准确理解国际政治的结果，而必须从系统层次寻找原因等。<sup>②</sup>本文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些观点，但不认同华尔兹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做法。在下文有关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叙述中，单元将发挥结构决定论者意料之外的作用。

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是一种跨层次分析的有益尝试，但其把结构视为一个常量或是淡化作为一种背景因素或环境因素，导致体系结构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各类理论模型中不起作用。而且新古典现实主义忽视了国际结构与国内因素的关联性，如当国际结构发生变化时特定国内因素的作用是否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国际结构下相同的国内因素的作用是否一样等。这意味着新古典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国内政治因素解释国际现象的还原理论。

2022年，美国学者乔纳森·柯什纳（Jonathan Kirshner）在其专著《不清晰的未来》中也批评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逻辑。他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建立在对微

---

①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33—47页。

②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4—50、69—73页。

观经济学寡头竞争理论误读的基础之上。华尔兹以为寡头垄断竞争的结果是确定的，没有正确解读市场压力的企业都将受到惩罚乃至被淘汰，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企业虽然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但它们反过来也塑造了其他参与者所面对的市场力量。而且寡头竞争理论认为寡头之间通过合作比通过竞争所获得的利益更大。将这一论断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作为“寡头”的大国的互动也会影响体系结构。因此，柯什纳呼吁将古典现实主义带回来，重视国家的选择以及国家间互动。<sup>①</sup>柯什纳虽然指出了结构现实主义存在的问题，但他主张利用古典现实主义分析大国政治现象，却对结构现实主义置之不理。

近年来，阎学通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在对领导人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从次单元层次出发，历经单元层次并向上贯通到体系层次的理论。也就是说，不同的领导人类型（次单元因素）决定了不同的国家类型（单元因素），进而塑造了不同的国际格局、秩序和规范（体系因素）。<sup>②</sup>道义现实主义基于还原理论，但又意在打通体系与单元之间的隔阂。笔者也认为领导人会对单元产生较大影响，但怀疑它能对体系产生长期的本质性影响。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来看，领导人的类型更迭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会导致道义现实主义对体系问题的解释走入偶发因素决定论和不可知论。

## 二 结构压力与弱结构现实主义

体系与单元关系之辩已沉寂多年，学者们难以在体系与单元的功能区分以及相互关系的影响机制方面有新的发现。在此，本文提出一种弱结构现实主义，尝试重新思考体系与单元关系之辩。

弱结构现实主义是相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而言的。弱结构现实主义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两者的理论前提基本一致。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总结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五个理论前提：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具备进攻性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相互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行为体。<sup>③</sup>弱结构现实主义赞同前四

<sup>①</sup> Jonathan Kirshner, *An Unwritten Future: Realism and Uncertainty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sup>②</sup> 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sup>③</sup>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34—35页。

个理论前提，但在大国是否为理性行为体这一点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结构现实主义为突出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主导作用而把国家原子化，假定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这是为了构建一个高度简约、适合于单变量解释的理论模型。弱结构现实主义为了平衡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并适当强调单元的能动性，没有假定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既承认国家具有一定的理性，也承认国内政治因素甚至个人因素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在这一点上弱结构现实主义与还原理论具有相似性。另外，弱结构现实主义同样认为国际体系包含结构和互动的单元两类要素，国际体系的结构由大国实力分配状态所决定并分为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模式。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国家行为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驱动力。结构对国家的各类行为施加奖励或惩罚，从而对行为进行筛选，最终使国家的行为逐渐趋同，某些固定的行为模式不断重现，这就是所谓的结构选择。在结构选择论的逻辑链中，结构与国家行为之间的一个逻辑环节被忽略了。结构并非直接驱动国家，而是先产生结构压力（或者说体系压力），这一压力再驱使国家采取相应的行动。结构现实主义忽略了结构压力问题。弱结构现实主义恰恰认为结构压力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变量，其可大可小。当结构压力大时，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加剧；当结构压力小时，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趋于温和，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缓解。

结构压力如何产生，又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结构压力并不是体系结构自然产生的，而是由国家间互动产生的。国家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会促使结构压力发生变化。例如，当崛起国挑战守成国核心利益时，结构压力会非常大；当崛起国与守成国在边缘地带竞争时，结构压力并不太大；当崛起国与守成国就某些重要问题达成协议时，结构压力会显著下降。由于结构压力源自国家间互动，因此国家能动性的重要性突显，而国家的能动性又来源于国内相关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因素和决策者因素，因此弱结构现实主义不能假定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而必须打开国家“黑箱”。但打开国家“黑箱”并非弱结构现实主义的目标而是前提，这一点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具有本质区别。弱结构现实主义需要知道国家这个“黑箱”内发生了什么，但不致力于研究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

如果只是强调国家间互动产生了结构压力，那么弱结构现实主义与还原理论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弱结构现实主义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仍然强调结构对单元的作用。结构压力产生后，在一段时期内又

会反过来相对独立地作用于单元。特别是当结构压力不断增大时，受到压力驱使的国家就会越来越严格地按照体系结构的要求采取行动，更加难以摆脱结构压力。

弱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从中长时段来看，结构压力是一个处于非线性变化状态的变量。国家行为的变化会促使国家间互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方向和速度都具有不确定性。结构压力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段内上升、下降或不变，但可能因为某一事件而突然转变方向。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国采取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由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中国面临巨大的结构压力。但随着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面临的压力骤然减轻。结构压力可以在某个时段内急剧上升或下降。例如，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后，英、法、德、奥、俄五国围绕该事件互动所造成的结构压力陡然上升，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前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已在不断加剧，结构压力处于上升期，但刺杀事件的确使压力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急剧升高。

结构压力在某种极性状态下是否比在另一种极性状态下高/低？弱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压力与极性无关。由于结构压力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在任何一种极性状态下都有可能处于上升、下降或波动状态。华尔兹认为两极格局比多极格局和单极格局更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两极格局下结构压力相对更弱？弱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两极格局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一方面，对手的明确性使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方式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明了，这有助于减少结构压力的波动性；另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巨大的体量使它们一旦发生“碰撞”，就会使结构压力急剧上升。冷战期间，美苏在柏林和古巴的直接对抗均有可能使“冷战”变为“热战”。<sup>①</sup>

弱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结构并非对单元始终产生恒定的压力，从而使单元受到压力的驱使去采取相应的行动。结构压力其实是变动不居的。<sup>②</sup>因此，结构选择不是立刻选择和时刻选择，而只是一种可以预测和观察到的长期趋势。受这种

<sup>①</sup> 冷战时期两极的稳定性究竟是由于两极本身的特征还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于大国之间极力避免爆发核战争，因此核武器可以有效控制结构压力在短时期内迅速上升。

<sup>②</sup> 这里存在对结构压力进行衡量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提出结构压力的研究意义以及可能的整体性研究方向。如何观测结构压力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可以采用观察单位时间里国家间关系下滑的幅度、主要大国军费开支的变化和国际危机的频度等指标来表征结构压力。

长期趋势影响，单元的互动将出现两个特征：一是大国将围绕国际体系的霸权而展开竞争，因此其关系呈不断下滑趋势，但下滑速度和幅度取决于国家的能动性与互动性。这就是弱结构现实主义主张的结构选择。二是大国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争霸。受领导人、国内政治或意识形态影响，大国会在某个时间段追求与霸权无关或只是间接相关的目标，从而延缓均势的变动，抑或在另一个时间段极力追求与霸权高度相关的目标，从而加速均势的变动。这就是弱结构现实主义主张的单元选择。

体系理论侧重于解释国际结果的变动以及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而单元理论侧重于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弱结构现实主义虽然也强调国际结果的变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但认为在实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静态的实力结构只是体系结果的一种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单元能动性通过其造成结构压力的变动也会对体系结果产生影响。弱结构现实主义与单元理论同样关注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单元理论（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可以解释国际结果，因此致力于挖掘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而弱结构现实主义把国家对外政策当作理论叙事逻辑的出发点，并不探讨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弱结构现实主义旨在把结构选择和单元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但在实际情况中结构和单元经常发生交互作用，那么在研究中如何判断是哪个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呢？例如，如果决策者意识到受体系限制，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该决策者就会将上述限制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纳入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这既体现了体系对决策者的限制，也反映了决策者对体系限制发挥了能动性。<sup>①</sup> 弱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尝试从三方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的决策者能够正确认识到体系对单元的限制，而有的决策者缺乏正确的认知，那么这两类国家间的互动就可能造成结构压力的非线性变动，即单元能动性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符合弱结构现实主义的预期。<sup>②</sup> 其次，某一个决策者在其任内可以做到正确认知，但无法保证继任者也是如此。决策者还要综合考虑多种可能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有时候未必能顶住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从而将体系因素置于次要地位。最后，弱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结构只是为决策者展示了一种宏观甚至带有一定模糊性的长时段发展趋势，或者说是提供

---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这一重要问题。

② 如果每个决策者都能考虑到体系对单元施加的限制，就可以构成强结构主义者脑海中最理想的画面，而这在国际关系中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弱结构现实主义研究的对象。即使这一理想画面能够出现，它也只能短期存在，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了一种有较强弹性的长时段宏观决策参考框架。由于单元不是结构的“奴隶”，因此决策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思考和解释特定体系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意义和作用。

下文将采取多案例集合研究的方式展示弱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这些案例同处于一个较长的特定时间段，且大致具备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一致性。格局一旦形成就具有长期性和静态性，而单元能动性会造成结构压力时常发生变化，所以用局限于一个较短时间范围和较小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特定事件难以深入探讨长期静态的格局同非线性变化的结构压力之间的关系。鉴此，本文采用发生在某一格局存续期内的一系列案例来展示结构压力的变化。

### 三 弱结构现实主义视野下的欧洲多极格局（1871—1914年）

1871—1914年的欧洲外交史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示弱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sup>①</sup>在此期间，欧洲处于多极格局，英、法、德、俄、奥五国纵横捭阖，逐渐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后，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在一个月内向公开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外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外交政策。

主张还原理论的学者（包括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特别是大战略学者以及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俾斯麦时代的大战略堪称典范，其有效避免了德国崛起引起的国际震荡，同时以复杂的同盟体系避免了其他大国对德国崛起的担忧和恐惧。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大战略则被认为出现了严重问题。德国的不当行为导致欧洲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最终导致1914年“七月危机”之后世界大战的爆发。还原论者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如果德国能够改变自己并全部或部分避免所犯的 error，那么德国崛起不仅可以持续下去，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概率也会大大减少。<sup>②</sup> 结构

<sup>①</sup> 本文从理论和逻辑困惑出发，尝试运用演绎方法构建新的理论，案例是对这一理论的展示性说明。这种理论构建方式虽然不会完全排除经验困惑，但不是基于经验困惑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与运用归纳法写作的问题解决型论文有较大区别。

<sup>②</sup> Sidney F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28; Fritz Fischer,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姜鹏：《隐忍的崛起：基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是当时的体系结构驱使欧洲大国进行越来越激烈的战略竞争，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集团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与德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与其犯过什么样的战略错误无关，它们之间终有一战。<sup>①</sup>

从弱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两类研究都存在一些问题。还原论者忽视了结构的力量，未能看到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对抗是结构性矛盾驱使的结果。结构现实主义者则描绘了一幅过于阴暗的历史画面，既无法解释欧洲为什么从 1871 年到 1914 年保持了 43 年的长和平，也无法解释为何欧洲大国并不是时刻关注权力均势的变动。

### （一）弱结构现实主义的单元选择

从 1871 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到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欧洲大国的政策目标并未集中在欧洲大陆均势的变动之上，而是各有追求。各大国政策目标的分散性使大国之间的互动没有产生强大的结构压力，体系均势由此基本保持稳定。

德国采取自我克制与多重结盟的政策，极力维持欧洲均势，有效规避了结构压力。德意志实现统一后，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深知一个从欧洲心脏地带崛起的强大国家有可能引发各大国的普遍担忧。位于四战之地的德国一旦寻求继续扩张，必定会引发欧洲其他大国的强势反弹，所以他公开宣布德意志统一后不再寻求领土扩张。另外，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多有克制，力图通过缔结多重同盟的方式维持均势，规避和防止结构压力。“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由于相互间关系而需要我们，并且尽可能地避免组建反对我们的联盟。”<sup>②</sup> 他要使德国与其他大国的距离小于后者彼此间的距离，包括使德俄间距离和德奥间距离小于俄奥间距离。

俾斯麦极力避免给人以德国主宰欧洲大陆的印象，因为他十分珍视并致力于维护欧洲的君主保守主义秩序。为维护欧洲君主政体的稳定，他首先想到的是恢复梅特涅时代的神圣同盟。1873 年 6 月，俄奥两国皇帝签订《兴勃隆协定》，约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威胁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同年 10 月，德皇加入这一协定，从而结成第一次“三皇同盟”，这在形式上恢复了梅特涅时代的神圣同盟。第一次三皇同盟孤立了法国，拉近了德俄、德奥双边关系以及德奥俄三边关系，将德国可能面临的结构压力化解于无形。然而，三皇同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俄奥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德国该如何维护德俄奥三

---

①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 387—505 页。

② 转引自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第 221 页。

边合作？尤其是在俄奥矛盾突显时，德国应该怎么办？事实上，俄奥因彼此间矛盾而相互牵制并有赖于德国，从而不愿或难以与德国为敌。不过，如何控制俄奥矛盾升级是德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1875年波黑发生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后，由此引发东方危机。英、俄、奥、土等大国围绕波黑、土耳其和黑海海峡等问题展开博弈。1877年，俄土战争爆发，俄军大败土军，逼近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1878年，俄土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俄国极大地加强了在巴尔干地区的优势地位。该和约遭到英奥两国的强烈反对。英奥要求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议和约条款，同时进行军事动员，英奥与俄国在巴尔干的战争乌云密布。1876年10月，沙皇向德国官员表示，一旦俄奥爆发战争，俄国希望德国站在自己这一边。俾斯麦回复称，假如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或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从此以后确保势力均衡的因素之一就会消失，那样也会严重威胁到德国的利益，虽然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并无利益纠葛。<sup>①</sup> 不愿意在俄奥之间选边站队的俾斯麦公开表示，愿意出面在英奥俄土之间充当“诚实的掮客”，斡旋东方危机。1878年6月13日，柏林会议开幕。经过一个月的激烈较量，7月13日各方签署了《柏林条约》。柏林会议是俄国外交的一大失败，其在《圣斯特法诺和约》中的绝大部分收益付之东流。英奥德三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英国和奥匈挡住了俄国在巴尔干势力的回归，德国则因柏林会议的召开而一举成为欧洲外交的中心，俾斯麦以“公正无私心”的态度扮演了一名“掮客”，成功地使与会各国的显要都围绕在自己身边，并催生了一种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多极均势。<sup>②</sup> 从这个角度来讲，柏林会议的划时代意义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在什么地方举行。

然而，《柏林条约》没有给巴尔干地区的难题提供永久性解决方案。俄国迁怒于德国，认为俄国在普法战争和德意志统一战争中都站在普鲁士一边，而德国现在却不知恩图报。尽管俾斯麦辩称自己的立场不偏不倚，一切决定均由大会做出，但俄国还是指责俾斯麦赞同英奥的态度。由于俄奥与俄德矛盾的发展，第一次三皇同盟形同解体。

在德俄奥三边合作一时恢复无望时，与俄奥中某一方联合便成为俾斯麦的现实选择。维持德俄友好是俾斯麦外交的支柱之一，但他又不愿倒向俄国，因为这

<sup>①</sup> 埃里克·埃克著，启蒙编译所译：《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页。

<sup>②</sup> 参见A. J. P. 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35页。

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结构压力，使德国（很大程度上因其地理位置）要比俄国更多地承受西方大国（英国和法国）与奥匈结盟的军事压力，并让德国不得不更多地依附俄国。俾斯麦认为他一生的政策都是在不让德国承担俄国排他性保护的前提下培养与俄国的友好关系。<sup>①</sup>因此，他认为德奥结盟更胜一筹。首先，德强奥弱的实力对比状况既可以使德国更方便地控制奥匈帝国，特别是防止其在巴尔干地区采取冒险行动而与俄国发生冲突，也有助于防止德国因被俄国击败而丧失大国地位，并导致均势失衡。其次，德奥秘密结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刺激俄国，为未来的三国合作留下操作空间。最后，德奥同盟可以防止法奥接近，起到孤立法国的作用。德奥结为同盟之后，为防止俄法接近，俾斯麦于1881年6月18日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再次签订了三国协定，第二次三皇同盟成立。为照顾俄奥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利益，三国在协定的秘密条款中规定：奥匈对土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保留随时吞并之权；三国不反对保加利亚和土属东鲁米利亚的合并。<sup>②</sup>

作为欧洲的新兴强国，意大利与法国在北非和地中海控制权问题上的矛盾加深。俾斯麦抓住机会拉拢意大利，于1882年5月20日成立了德奥意三国同盟。根据三国同盟条款，当法国进攻三国中的任何一国时，其他两国应全力予以协助；当缔约国的一国或两国遭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法俄）进攻，则缔约国应协同作战；当一大国（俄国）攻击缔约国一方时，其他两个缔约国应保持善意中立。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防备法俄两国的同盟。另外，1881年奥匈帝国在俾斯麦的支持下与塞尔维亚结为同盟，使塞尔维亚成为奥匈帝国的保护国。1883年，德国、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结为同盟，俾斯麦同意将罗马尼亚划入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sup>③</sup>奥塞同盟和德奥罗同盟的建立都是旨在防止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

英国也是俾斯麦重点关注的国家。由于法国和英意两国在争夺北非殖民地方面矛盾重重，俾斯麦便怂恿英意奥三国加强合作。1887年，英意奥三国两次就地中海、亚得里亚海、北非和近东等问题达成合作协议。两次地中海协定形成了三国联

<sup>①</sup> 乔治·皮博迪·古奇著，吴莉苇译：《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9页。

<sup>②</sup>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sup>③</sup> 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修订本），第220—225页。

合在地中海和近东抵制法俄的局面。为安抚俄国，德俄于1887年6月18日签订了《再保险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除外）交战，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占优势的合法性，双方维持巴尔干地区现状并重申黑海海峡对外国军舰封闭。附加议定书规定，当俄国采取行动保卫黑海入海口时，德国保持善意中立，并给予俄国道义和外交支持。<sup>①</sup>但是俾斯麦清楚，如果俄国发起此类行动，英奥必然反对。这样一来，两次地中海协定与《再保险条约》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形成了英奥意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在地中海和近东相互牵制而德国遥控各方的局面。

至此，俾斯麦织就了一张以德国为中心、繁复无比的同盟网络。“俾斯麦这位强大的首相如巨人般驾驭着欧洲，弱小一点的人们焦灼地看着他的脸色行事。”<sup>②</sup>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友，英国对德态度友好，俄国是三皇同盟的一员，塞尔维亚的野心暂时得到抑制，罗马尼亚的国王则来自德国的霍亨佐伦家族。另外，德国的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将军帮助土耳其重组军队，并为德国人在该国的影响奠定了基础。<sup>③</sup>

俾斯麦同盟网络是维持欧洲均势、控制结构压力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出于各种原因，英、俄、法、奥、意等国在这一时期也采取了有利于欧洲均势但并不引发结构压力迅速上升的政策。英国并未将德国统一视为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破坏，反而认为这有益于反制法俄两国的霸权野心。英国对于俾斯麦外交总体上表示支持。俾斯麦构筑的同盟网络既遏制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和海峡问题上的野心，也遏制了法国对地中海的野心以及对德国的领土复仇主义。欧洲大陆的东、西、南、北两端以及近东、地中海地带都保持了令英国满意的均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外交眼光从欧洲大陆转向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外交的主轴。英国历史学家A. J. P. 泰勒（A. J. P. Taylor）指出，英国人对均势已失去了兴趣。绝大多数英国人到这时都承认欧洲大陆上的事件与自己无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英国和它的贸易是不会遇到危险的。由于德、法、奥、俄经常相互抵消力量，没有必要让英国人去做任何事情。1864—1906年，没有一个英国政治家必须考虑派遣远征军去大陆的问题。<sup>④</sup>英国在殖民扩张中也与法、德、俄等大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有些矛盾曾一度激化甚至走到战争边缘，如1898年英法为争夺东非殖民地而爆发了

①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二版），第175页。

② 乔治·皮博迪·古奇：《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第56页。

③ 乔治·皮博迪·古奇：《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第56页。

④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373—374页。

法绍达危机。但这些殖民地矛盾只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对欧洲核心地带的均势并未产生本质性影响。<sup>①</sup>

尽管 1878 年的柏林会议是俄国外交的一次失败，但它只是让俄国放弃了刚刚获得的利益，而不是割让早期既得利益。黑海海峡仍然对各国封闭，俄国黑海舰队虽然不能通过黑海海峡抵达地中海，但英国的舰队同样也无法进入黑海。俄、奥、英在巴尔干地区仍然维持均势，俾斯麦的同盟体系阻止了俄国势力向西欧和南欧延伸，但也阻止了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对付俄国。俄国因此也走上了向东方扩张的道路，直到它在 1905 年与日本的战争失败后，目光才再次转向欧洲。

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使得德国和法国的矛盾更加不可化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时刻处于战争危机当中。事实上，法德关系在 1871 年之后总体上保持和平，直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从来没有忘记收复领土，但对德强法弱的实力对比状况也非常清楚。1875 年“战争在望”危机和 1886 年布朗热主义的后果表明，法国的领土复仇行动得不到欧洲大国的支持。1875 年年初，法国政府向议院提交了改组军队的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每个团中营的数量从三个增加至四个。俾斯麦认为这是法国扩军备战的一个标志。随后，德国发布了禁止出口马匹的命令。<sup>②</sup>与此同时，意大利国王与奥匈帝国皇帝在威尼斯的会晤也使俾斯麦怀疑他们正在筹备奥意法三国同盟，以支持教皇并敌对反教权的德国。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不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而是通过报刊鸣响警钟”。<sup>③</sup>这些文章在欧洲一度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认为这是俾斯麦在幕后操纵，而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俄国开始介入事端。1875 年 5 月 10 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和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 (Alexander Gorchakov) 抵达柏林。他们告诉威廉一世 (Wilhelm I) 和俾斯麦，倘若法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欧洲其他大国不会作壁上观。威廉一世和俾斯麦都表示德国绝对不想要战争。在得到这两人的保证后，

① 这一时期英国的“光荣孤立 (splendid isolation)”是指英国不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并非指它不介入世界事务。相反，它孤立于欧洲之外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② 埃里克·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第 268 页。

③ 1875 年 4 月 7 日，与德国外交部关系非常密切的柏林《邮报》发表了题为《战争近在眼前吗？》的文章，指责法国重整军备。该文作者是德国政府新闻出版局的前任官员，他的身份使人怀疑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这也是本次事件得名为“战争在望”危机的由来。另外，《科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声称法国改组军队是为战争做准备，还用批判的措辞评论了威尼斯会议。该文作者是俾斯麦的首要新闻宣传员，他要求报纸编辑对原文不做任何改动，因为它“像官方文件一样，每个字都经过了仔细的权衡”。俾斯麦本人控制的报纸《北德意志综合报》也声称目前没有来自奥地利或意大利的危险，可是来自法国的危险相当大。转引自埃里克·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第 233—235 页。

沙皇于次日告诉法国驻德大使，俾斯麦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两国和平得以确保。<sup>①</sup>这次危机使法国看到，如果要向德国复仇，它找不到任何盟国。俄英不愿意看到德国或法国称霸西欧，只是希望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而在这一点上它们与俾斯麦见解一致。

1886—1887年，狂热的领土复仇主义者乔治·布朗热（George Boulanger）将军出任法国陆军部长，掀起了一股对德复仇的民族沙文主义浪潮。布朗热主义是一种兼有侵略性的威权主义、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狂热的复仇主义的混和体。1887年2月，具有保守党倾向的英国《旗帜报》发表了一篇发人深思的文章，文章称如果德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侵犯比利时领土，英国不会“捍卫比利时的中立”。据称此文出自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的精心策划。由此可知，英国政府是在暗示，当德法发生战争并且德军进入比利时领土时，英国将保持中立，不会支持法国。索尔兹伯里侯爵选择站在俾斯麦一边，对法国不断施加压力，有效打击了布朗热主义。1887年6月，布朗热被免去陆军部长一职，法德战争危机再次解除。<sup>②</sup>这次由布朗热主义引发的战争危机也证明了法国收复领土的时机并不成熟。

俾斯麦当然希望消除法国人的复仇之心。他有意通过怀柔之策减少法国人的敌意，尤其是在1875年后，“战争在望”危机中英俄的干预让他更多地看到了战争手段的限度，法国国内政治的有利变化也让他更愿尝试怀柔手段。柏林会议后俾斯麦向法国代表保证，他建立的同盟体系旨在防止奥俄战争，而不是防备法国复仇。俾斯麦多次对法国表示：除莱茵河外，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将支持法国。1882年俾斯麦对法国驻德大使说道：“我要的是息事宁人，我愿意言归于好。我们没有任何道理去想方设法伤害你们；我们倒是处于还欠你们一笔补偿的地位。”<sup>③</sup>

收复领土暂时无望的法国转向殖民扩张。法国在殖民扩张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也与其他大国产生了不小的矛盾。法国因埃及问题疏远了英国，又因突尼斯问题疏远了意大利。俄国受制于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爱莫能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的外交态势是相对孤立的，而这正符合俾斯麦的意愿，他一再鼓励

① 埃里克·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第238页。

② 引自 T. G. Otte, *The Foreign Office Mi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65-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76.

③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371—372页。

法国继续进行殖民扩张。俾斯麦期待法国保持殖民扩张的势头并由此扩大与英意的矛盾，更加无力关注法德边界问题。

奥匈帝国和意大利是欧洲大国中实力相对较弱的两个国家。得益于俾斯麦同盟网络的庇护，奥匈帝国可以宣称它遏止了俄国向巴尔干的进军，维护了本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意大利则可以宣称它在与法国关于北非和地中海的竞争中不落下风。总之，德国的崛起没有引起欧洲均势的大动荡，欧洲多极格局的结构压力没有明显上升。

## （二）弱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

1890年，一系列国家间互动的变化使欧洲大国的眼光又重新汇聚到欧洲多极均势上来，它们逐渐分裂成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均势的变动使结构压力逐步上升，各大国的政策选择空间不断收窄，并在1914年“七月危机”后处于失控的边缘。

在威廉二世（Wilhelm II）继位和俾斯麦去职之后，德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型的过程。在俾斯麦时代，他坚持德国是一个欧洲大陆强国，必须从欧洲大陆出发考虑外交问题，像英俄那样热衷于殖民扩张对他来讲不过是转移一下精力，或是利用殖民地问题拨弄英法关系。<sup>①</sup> 俾斯麦认为：“我的非洲地图是在欧洲。这儿是俄国，这儿是法国，而我们则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sup>②</sup> 1897年之后，德国外交开始了所谓“世界政策（Weltpolitik）”时代，也就是眼光不要仅限于欧洲大陆，而要像英国那样，更多地从世界角度看待外交。<sup>③</sup> 由此，德国要突破地理因素对其形成的限制，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泰勒评论称：“新德国所意识到的只有它的力量；它看不到危险，不承认存在任何阻碍……俾斯麦当政时，他曾经是对列强的和平保证，尽管这种和平局面是由德国来组织的。现在列强不得不寻求其他的保证了——而且最后是针对德国本身的和平保证。”<sup>④</sup> 但是扩张会遇到来自别国的阻力，这让德国以为是其他大国在联合反德。正是这种扩张不断引发和激化了法、俄、英等国的反作用力并延伸到欧洲大陆，催生了难以逆转的结构压力，

① 参见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 386—388 页。

② 转引自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 386 页。

③ “世界政策”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就连使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指导性方针的比洛本人也没有给出准确的说明。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世界政策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它的初衷是面对国内舆论，是加强民族团结以及用长期的预算投入对国家议会造成压力的手段，使持不同政见者（如社会民主党）保持安静，借此巩固现有的主导型工业和政治局面。参见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董莹、肖潇译：《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2 页。

④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 424 页。



使欧洲不断分裂为两大军事集团。

1897年出任外交大臣并于1900年出任首相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是德国执行世界政策的操盘手。比洛认为，在德国崛起为欧洲霸权国之前会有一个遭遇其他大国联合反对的“危险地带”，一旦渡过这个时期，德国将强大到没有哪一个强国甚至强国集团敢于向它进攻。在那之前，比洛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保持行动自由，即同俄英两国都保持良好关系，而又不向任何一方做出承诺，因为他假定英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既安全又有利。1898年，德国曾与英国商谈两国结盟的问题，但谈判最终归于失败。与英国结盟是德国长期以来想要达成的一项外交政策目标，但德国希望英国承诺在法德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或至少保持中立，而英国想要德国在远东、中亚以及非洲殖民地问题上支持自己，结果双方都发现自己无法满足对方的要求。英国不愿意在法德争端中预先表明立场，德国不愿意因为支持英国的殖民扩张而与俄法交恶。英国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主动寻求与德国合作，而德国不愿意卷入任何反俄事务，因为英国海军对他们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总之，德国正试图使自己既是欧洲强国又是世界强国。德国在欧洲的安全要靠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其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则要靠英国的善意，因此必须同俄英都搞好关系。德国人真正希望的是俄英之间开战，届时德国可以向双方高价出卖自己的中立。

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在实践中德国虽然未犯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但小错误积少成多，其累积效应不可小视。以“克鲁格电报事件”为例。1896年1月3日，正当英国殖民者与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矛盾不断上升之时，威廉二世给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发去电报，祝贺他“在没有向友好强国呼吁支援的情况下”保持了独立。威廉二世还邀请俄国和法国参与进来，共同对英国施压。但是英国并未屈服于对方压力，反而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特遣舰队前往南非，使得德国自称能保卫德兰士瓦的承诺成为世界的笑柄。德国只好又表现得好像不应该把“克鲁格电报事件”看得太严重。同年1月10日，德国外交部高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Frederich von Holstein）写道：“如果事情的结束就像看来正在发生的那样：德国得到一点小小的外交上的胜利，英国得到一点小小的政治上的教训，那就让我们感到满意吧。”<sup>①</sup>但是这次事件在英国和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度严重恶化了英德关系。英国认为这个电报威胁到其殖民帝国大业，因而不能容忍。德国在两次摩洛哥危机中的表现则使其与英国和法国的

<sup>①</sup>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475—476页。

关系更加恶化，并促使英法走得更近。

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虽然保证了德国政策的灵活性，但客观上却进一步加强了德国的孤立状态。英国没有对德国做出任何安全承诺，而法俄同盟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在欧洲的活动空间。然而德国政治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相信英法与英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保证这些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德国。当英国出乎德国意料地与法俄两国相继达成协议以解决它们之间的殖民地纠纷后，德国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难以为继，其未来的行动受到了更多约束。

德国争取英国、离散英法关系的最后一次努力是1909—1911年的英德海军谈判。德国提议两国签订一个限制海军军备的公约，同时约定彼此都不发动反对另一方的战争，不加入矛头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联盟；如两国中任何一国与第三国（或更多国家）进行敌对行动，另一国应遵守善意中立。<sup>①</sup> 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表示，只有英国愿意签订一个全面的政治协定，他才会在海军军备方面做出让步；而如果有了这样的协定，在海军方面做出让步就不必要了。英国的考虑则正好相反。英国表示只有德国无条件削减海军计划才会令其满意，而如果削减了海军计划，即使不签订正式协定，两国政治关系也会得到改善。<sup>②</sup> 另外，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认为，德国的这个方案要价太高，不仅会限制其海军军备，而且有利于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因此，他不能承诺，如果德国和法国同俄国交战，英国将不介入。他甚至不能发表一个表示赞成欧洲维持现状的声明，因为任何看来是确认丧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安排，法国都不可能参加。<sup>③</sup> 这场谈判的唯一结果是英德之间的猜疑加剧。英国由此深信，德国不仅决心挑战英国的海上优势，还要在欧洲建立统治地位；德国也同样深信，英国在阴谋联合法俄两国“包围”德国。自此，三国协约更加稳固，德国转而强化德奥关系，以免失去这唯一的盟国而孤立无援。

英俄与法德是两类不同的国家。法德本质上是大陆强国，它们关注的重点是欧洲大陆，而英俄两国相对于欧洲大陆核心地带来说都是欧洲侧翼大国，总的来说它们希望欧洲保持平静，这样它们便可以追求其他目标。大致以1905年日俄战争为分界线，此前英俄两国致力于构筑殖民帝国，相对不是很重视欧洲大陆事务；此后两

---

①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590页。

②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592页。

③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第591—592页。

国把关注点从殖民地事务转向了欧洲大陆。这一外交重心的转移使欧洲格局的结构压力开始明显上升。

前文提及法国因无法夺回割让给德国的领土而暂时转向殖民地的争夺，由此在埃及等非洲殖民地问题上成为英国和意大利的强劲对手。1898年，英法两国军队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苏丹的法绍达地区相遇并对峙。经过一系列外交磋商，法国最终撤军，英国获胜。法国主动屈服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实力孱弱。法国海军实力太弱，而英国只要愿意就能占领法国在非洲的整个殖民帝国。<sup>①</sup>二是法国无意再增加一个敌人。法国的首要敌人是德国，再与英国为敌的代价太大，这么做只会有利于德国，并毁掉任何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机会。1903年，英法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为两国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营造了良好氛围。1904年4月，英法签署一系列协定，就有关非洲和远东殖民地的控制权问题达成谅解。协约的签订也为英国进一步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并转向欧洲大陆事务创造了部分条件。1906年1月，在为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而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上，英国全力支持法国对抗德国，两国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

英法协约签订前后，法国围绕法意关系展开了一系列外交行动。1900年12月，法意签署协定，划分了双方在北非的势力范围。190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续订时，意大利有意拉开与德奥的距离。意大利向法国保证，续订条款中没有针对法国的挑衅，意大利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入侵法国或威胁法国的安全。自此，意大利开始在两大集团之间观望，法国由此解除了来自南部的安全威胁。在解决了法英和法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后，法国开始重新关注法德关系问题。这对德国意味着危险来临。当法国致力于殖民地争夺时，法德关系是安全的；一旦法国开始关注欧洲大陆事务，那么法德关系的恶化就是可以预期之事。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认为俄国是其最强劲的对手。英俄在远东、中亚、阿富汗和近东等地区反复争夺，这其实也是俾斯麦当年能够成功构建欧洲多极均势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例如，中亚的安全关乎整个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存亡和英国世界霸权的兴废，因为俄国一旦征服中亚，就可能通过阿富汗威胁到英属印度。中亚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也考验着英国的外交政策。正如后来担任英国首相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ell-Bannerman）所言：“害怕俄国人入侵印度，是断断续续萦回于英国几代人脑际的噩梦。”格雷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向印度边界的

<sup>①</sup> 乔治·皮博迪·古奇：《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第216页。

推进是最敏感、最危险的问题。”<sup>①</sup>

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英俄都感到有必要在殖民地事务方面达成一定的妥协。1885年之后，随着俄国在中亚的大规模扩张趋于结束，英俄在中亚地区的激烈争夺也渐趋平静。1885年9月，英俄初步划分了俄国与阿富汗的边界。1895年，英俄划分了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此后，俄国的战略关注重点从中亚转向远东。在远东，随着日本的崛起，英国发现日本正在成为抵挡俄国势力南下的屏障，于是于1902年与日本结盟，在远东共同对抗俄国。英日同盟的形成使日本处于对抗沙俄的前沿，英国则退居后方予以支持。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英日一方与俄国一方为争夺远东而进行的决战。1907年7月，俄国与日本签署秘密条约，明确划分了两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同意维持现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趋于结束。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达成关于划分双方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势力范围的条约。至此，英法和英俄相继解决了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议，而法俄早在1893年即已结为同盟，英国加入法俄同盟而形成三国协约的前景一片光明。在摆脱了殖民地问题的羁绊后，三国将其注意力转向更加危险的欧洲政治博弈，导致欧洲大陆结构压力上升的一股力量已经形成。

奥匈帝国虽然在欧洲大国中实力相对较弱，但却拥有启动危险的欧洲政治游戏的“钥匙”即巴尔干问题。当英、法、俄三国之间解决了殖民地问题后，奥匈却不合时宜地开启了欧洲大国的“巴尔干游戏”。由于担心塞尔维亚统一整个南斯拉夫，进而把奥匈帝国挤出巴尔干地区，奥匈帝国于1909年宣布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sup>②</sup>奥匈帝国的这一举措意欲达到一石多鸟的目标。首先，奥匈帝国希望通过兼并措施激发本国各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重振王朝雄风。其次，奥匈帝国意欲以此举向德国表明，其作为同盟伙伴还是有实力和有作为的。再次，奥匈帝国判断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国力大减，不会强力介入此事。最后，吞并波黑有助于奥匈帝国取得巴尔干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要地萨洛尼卡，由此构建一条贯穿马其顿地区与新帕扎尔地区的走廊，将其与奥匈帝国连接，控制爱琴海港口通往中东与亚洲的贸易路线。

奥匈帝国的这一举措立即引起德俄两国的高度关注。德国支持奥匈帝国的兼并政策，但先致信俄国，希望以两国联手向有关各方交换备忘录的方式来承认兼并有

---

<sup>①</sup> 转引自杜哲元：《中亚大变局与英国的政策应对（1864—18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sup>②</sup> 根据1885年《柏林条约》第25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归奥斯曼帝国，治权归奥匈帝国。

效。俄国无意促成此事，因此对德国的提议置之不理。德国首相比洛于是单方面宣布：“德国政府高兴地提及，俄国政府认识到德国这一步的友好精神，并且俄国看来倾向于接受该提议。（我们）已经准备好建议维也纳内阁邀请各国，同时通知她们正式赞同取消《柏林条约》第25条。任何模棱两可的答复都必定被我们视为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让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可能发生之事的责任都舍此无二地取决于伊兹沃尔斯基。”比洛自认为采取了温和施压方式，但全世界都认为他十分接近于下了最后通牒。<sup>①</sup> 实力孱弱的俄国此时无力也无意反对合并，否则在奥塞冲突爆发之时将自取其辱。失去俄国支持的塞尔维亚也只好承认其权利未因兼并而受到侵害。奥匈帝国兼并波黑加剧了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对立。德奥关系得以加强，但也意味着德国更难控制一个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的奥匈帝国。俄国认为这是一次屈辱的失败，于是加强了与英法的关系，三国协约更加稳固。另外，俄国趁机加强了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系，并宣称“巴尔干斯拉夫人理想的实现只能在俄国对同盟国取得胜利后方才可能”，<sup>②</sup> 这导致欧洲大陆结构压力上升的另一股力量也已经形成。

当德国在两次波斯尼亚危机中全力支持盟国时，法国却表现出极其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全力支持自己的盟国俄国。这是因为法国长期以来认为本国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太大的利益，为支持俄国把自己牵连进去并不划算。1912年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相继出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和总统后，彻底扭转了法国的巴尔干政策，转为全力支持俄国对抗奥匈帝国。普恩加莱在上任总统的第二天即公开宣称他将“保持与俄国之间最正直的关系”，并且“在充分与对方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外交政策”。随后他又向俄国人重申，如果俄奥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分歧升级为战争，法国将向俄国伸出援手。<sup>③</sup> 法国巴尔干政策出现转向是因为其认识到以前所谓“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大陆”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了，俄奥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触发德奥两国的联合行动；如果法国此时保持旁观，则法俄同盟就失去了意义，而法国不能失去俄国这个盟友。此后，俄奥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因两股力量之间的不断碰撞引发的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加，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呈现无法遏止的加速下滑之势，而引爆双方关系的导火索在1914年6月出现了。

<sup>①</sup> 转引自乔治·皮博迪·古奇：《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第306—307页。

<sup>②</sup> 乔治·皮博迪·古奇：《欧洲现代史（1878—1919）：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交涉》，第309页。

<sup>③</sup>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第247页。

## 四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旨在重新思考体系与单元之间的关系。弱结构现实主义既反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绝对结构选择，也反对还原理论的绝对单元选择，它试图在体系与单元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弱结构现实主义主张，体系必须通过结构压力才能驱动单元，结构压力是一个变量而非常量。结构压力的变化源于国家间互动的变化。这样，弱结构现实主义就恢复了单元的能动性，将单元互动与体系结构通过结构压力相关联，形成了单元与体系的双向互动。弱结构现实主义承认结构对单元行为的“选择”作用，但这种结构选择不是绝对的，并不意味着单元的完全被动，它只是一种宏观趋势，而单元具有能动性去影响这一宏观趋势的发展变动。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弱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预测较长时段内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变化；相较于还原理论，它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较长时段内大国关系发展的整体性趋势。

弱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具有一定的价值。当前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由此双边关系从中长期来看处于下滑态势。但是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并不等于结构压力的恒定，由于结构压力是个变量，这表明双边关系下滑的斜率是由双方互动决定的。如果双方对抗加剧，则结构压力上升，双边关系下滑的斜率增加；如果双方能够设法缓和对抗，则结构压力下降，双边关系下滑的斜率减小。由此，弱结构现实主义既反对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大国政治悲剧的命定式论断，也反对还原理论特别是大战略理论寄望于个人或团体能够一举扭转大国政治悲剧的愿望式论断。

(截稿：2024年6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Key Words】 geopolitics, technological change, geographic endowment, niche construc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uthor】 Ye Chengche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tructural Pressure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Xu Jin** (87)

【Abstract】 IR scholars have formed two major camps of “Structural Determinism” and “Agent Determinism”, based on their attitud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s and actor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aiming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t.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rejects both the absolute structural choice of structural realism and the absolute agent choice of various reductionist theories, instead attempting to find a third way. As a variant of structural realism,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develops its theory while adhering to a series of basic assumptions of structural realism (except that states are rational actors). It argues that systems can only drive actors through structural pressure, which is a variable rather than a constant. Changes in structural pressure stem from changes in state interactions, meaning that structural pressure is shaped by interstate interactions. In this way,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rehabilitates the agency of actors and forms a model of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actors. Compared with structural realism,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can better explain and predict changes in states’ foreign policies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over longer periods. Compared with various reductionist theories, it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overall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over longer periods. The policy value of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lies in its opposition to the deterministic judgement of structural realism, especially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regards the politics of great powers as a tragedy, as well as to the wishful inference of various reductionist theories, especially grand strategy theories, which hope that individuals or groups can reverse the tragic essence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one fell swoop.

【Key Words】 structural pressure, weak structural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systemic theory, reductionism

【Author】 Xu Jin,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Not All Domestic Variables Are Mediating Variable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in Neoclassical Realism**

**Feng Wei** (109)

【Abstract】 Neoclassical realism, which builds up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of structural realism, simplistically inserts domestic variable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resulting in two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flaws in the theory. First, it merely adds system-level and domestic factors without demonstr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ic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omestic mediating variables. Second, it confuses mediating variables with moderating variables, erroneously treating all domestic variable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which has been a direct cause of the ongoing difficulty i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domestic variables within neoclassical realism.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definitions of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and their roles in causal mechanisms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proposing two research pathways in neoclassical realism based on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variables in practice, this paper uses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 China since 2008 as a case study, constructing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both types of variables. Moving forward, neoclassical realism should integrate domestic variables based on the mediating variable research pathway, thereby achieving a more unified and streamlined theory.

【Key Words】 neoclassical realism,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dging strategy, 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China

【Author】 Feng Wei,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